



网课时代,看国外教育数据咋管理

□ 刘敏

加强立法,严保个人数据安全

2018年5月,欧盟议会出台了新的《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确立了保护数据隐私、恰当使用消费者信息、泄露预警、赋予数据主体更多权利等原则。《条例》替代了1995年颁布的《数据保护指令》,启动了新一轮数据安全治理行动。

教育信息属于《条例》列出的“特殊类型数据”,需要特别加强管理。教育信息涉及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涵盖了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到民族、照片、身高血型等各类数据,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数据。

根据《条例》要求,学校需要清晰了解数据储存是哪个部门完成的,或者是第三方完成,抑或双方共同完成,以便确认如何保护和处理数据以及由谁来保护和处理数据。学校须任命专人负责数据保护,在与第三方订立合同时也必须明确按照《条例》要求保护个人数据,数据保护负责人有责任对员工开展相关的知识培训。学校教职员工必须了解违规内容,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教师如想要引入新的学科专用软件或新的处理系统,须按照明确流程通知数据保护负责人。

在此框架下,欧盟多个国家就本国教育信息数据保护作出规定。2018年年底法国宣布对涉及向未成年人提供教育内容的平台建立信用评级制度,要求服务商在产品开发和设计阶段就落实未成年人信息保护要求,将未成年人数据使用和处理过程文档化。同时,法国教育部成立了“数据保护工作组”和“数据伦理及专业委员会”,为地方教育机构和学校选择平台服务商提供指导性建议(非强制性意见),进一步规范了地方教育机构及学校与第三方服务商签署合作协议的流程和内容,特别要求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个人数据时,必须获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网络平台等数据控制者有责任举证其获得了同意。

英国虽然脱欧,但2018年英政府以《条例》为基础发布了《英国数据保护法》以及针对教育数据的保护文件《数据保护:学校工具箱》。后者提出了增强数据保护意识、建立高水平的数据地图、明确记录处理数据的请求及处理时限等9条建议。

欧盟法律体系中包含指令和条例两种主要形式,前者需要各成员国根据本国情况转化为国内法,成员国拥有自主裁量权,而后者则对成员国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条例》生效后,不少国家已对违反行为采取了执法措施。比如挪威奥斯陆市政府就接到了200万挪威克朗的罚款通知,因为该市教育部门开发的家校合作软件对于个人数据的安全保护不足,在启动程序之前缺乏漏洞测试。

规范开发,让数据更好地服务教育

教育数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涉及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上述的个人隐私信息之外,还包括学生的学习轨迹、老师的教学及管理过程、学生的作业及评价结果等等。换句话说,学校数据包含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包括教育的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

在严格保护数据的前提下,当前超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很好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让多方受益。对学生而言,通过数据分析可以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中的优势和劣势,从而获取个性化的辅导或建议,得到更有针对性的资料推送;教师则可以通过研究学生的学习轨迹开展差异化教学;对于教育研究者和决策者而言,数据和统计则可以用于发展学习科学,科学开展政策评价和预测。

当前,我国教育部也委托了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中心等官方机构开展基础教育质量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不少省市也建立了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但前者的问题是评价结果旨在用于宏观决策,而非用于学校

改进或师生个体发展;后者的数据多用于总结性归档统计,或阶段性反馈,很少能够成为学生成长过程的“形成性和发展性”评价。

教育数据开发及服务方面,法国、芬兰等国家都有很好的做法。2017年,法国教育部在初中推行了一项“在校完成作业”计划,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放学后接受免费的个性化辅导,回家前完成作业。为配合这项计划,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开发了“数字化小助手”,可以即时回答学生的提问,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推送练习。芬兰在体育教育中使用了一款儿童专属运动传感器,手环与无线网络连接实现实时信息交互,可以高效、密集、快捷地收集到学生身上的各类数据,通过云处理做大数据分析,以图文形式反馈在终端,让师生可以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育运动情况,并根据学校制定的发展要求,强化优点,明确改进方向。

做好家长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元,有着不同的年龄、性别、性格、职业和文化背景等。

在家长参与方面,各国亦是各显其能。法国教育部、家庭事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开发了面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家长陪伴指南”手册。手册旨在帮助家长理解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和地方教育部门的做法;给予家长时间逐渐学习如何与学校通过技术手段加强沟通,追踪孩子的学业进展,掌握学校动态;指导家长监督孩子规范使用电子产品,控制使用时间和范围,过滤不良或危险信息等。同时指南也可以通过案例让家长了解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美国在2013年通过了《学生数字隐私与家长权利

法案》,明确了学生和家享有信息安全程序以及数据泄露的应对程序。同时法案赋予家长权利,可以查询并获取学校保留的学生个人数据。2016年英国网络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儿童在线安全:家长实用指南》,指导家长了解孩子在线实用社交媒体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提供了减少风险的实用“小贴士”,比如对“过度分享个人信息”的风险,家长要向孩子解释如何使用“隐私保护”保证只有被允许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图片,确保孩子使用的软件没有“地理定位”,提醒孩子使用“标签”模式等途径防止自己的图像被任意转发,同样地,在转发别人图片的时候也应该获取图像所有人的许可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基于数据研发的创新型技术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未来科技将释放更大的发展潜力和促进发展的潜力。然而建立完善的法规规则,管理使用数据是重要的前提。

教育数据具有其特殊性。加强教育数据管理一方面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通过多渠道多元教育宣传,建立全民的数据安全价值观;另一方面,则可以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三方参与的模式,鼓励教育数据的开发和利用,实现学习的个性化和自适应性,实现教育的革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通往藤校的黑箱:美国名校招生中的利益交换

□ 张明军 方圆

回首过去的2019年,是美国名校本科招生史上颇为动荡的一年。去年3月,不乏社会名流参与其中的大规模舞弊丑闻曝光,揭示众多家长通过中介伪造子女的申请材料和捐赠,获得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的入场券。去年9月,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宣布开始调查耶鲁大学是否在招生过程中系统性地非法歧视亚裔学生。去年10月,波士顿联邦法院对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案作出裁决,表明哈佛大学虽尚未违法,但录取程序“并不完美”,应加以改进,同时原告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同月,加州大学被要求停止使用SAT和ACT分数,因其与族裔身份和社经地位具有强关联,否则将面临起诉。随着各事件的发生,不少内部招生程序被披露,证实了美国名校(特别是私立名校)招生中长期隐秘存在的利益交换现象。

纵览美国名校数百年的招生历史,纯粹的贤能主义从未被践行,而是偏好以“切蛋糕”的方式分配录取名额。如果以学业成就为依据:一大块蛋糕(一般不少于70%)被作为“奖励”分配给了学业突出或学者和个人表现都不错申请者;一小块蛋糕(一般不多于27%)被作为“补偿”分配给了能够保证在大学顺利毕业的少数族裔、“第一代大学生”、贫困边远地区学生等传统弱势群体;还有很小一块蛋糕(一般不多于3%)则被作为“回报”分配给了学业一般甚至不合格的录取群体。

另外,对校友子女的倾斜,是美国高校招生中最广泛使用的特权,几乎存在于所有私立高校,甚至一些旗舰公立大学。2011年的数据显示,在耶鲁大学分别是30%和6.2%,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差距则最大,分别是33%和8.5%。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招办主任史蒂芬·法默也曾承认:“对于州外的学生,校友子女的身份在录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招办优先考虑校友子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有助高校传承办学历史和使命、提高注册率、回报校友给予的“才能、时间和财富”支持,因此不同于对其他后代隐形关照的否认,该倾斜是私立高校坦率声明的录取优先项。但需指出的是,许多校友子女的身份成就并不一定低,被录取未必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为了招收利益群体,不少名校曾经使用或仍在用预留名额的方式。例如,哈佛大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公开采用“快乐差生”政策,将相当一部分新生名额保留给在预备私立高中就读的成绩排名在后四分之一、但某些方面表现出色的学生(比如运动员)。其他常春藤盟校当时也实行过类似的双重录取体系。如今,南加州大学的生源中亦有约2%为捐赠者及其他事业发展助力者的子女。当然,由于政府和公共问责的监督,目前美国名校的招生官在评价过程中,不会直接向利益群体打开大门,而是将出身及其附加的利益作为加分因素,或在与其他申请者学业表现和个人成就相似的条件予以优先录取,或降低学术标准,并巧妙地将利益交换行为美名为“贡献能力”,从而衍生了招生腐败。

尽管美国名校出于维持精英地位和提供服务等需要,将有限的蛋糕馈赠给利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得已之处。然而,招生场域中利益交换的合理性,永远值得被拷问。因为优质招生名额的稀缺属性,使得任何倾斜必然是一场零和博弈。利益群体享有的特权,势必会挤占学业优秀但缺乏利益贡献的寒门子弟的入学机会。长此以往,名校集天下英才教育的使命岌岌可危,并可能变成贫富隔离的场所,成为东北地区八所名校组成的体育联盟,而非源于学术声望。如今,各类赛事仍备受追捧,比如在高校每年举办一次的校友返校日期间,校友们和在校生共同观看的橄榄球比赛,无疑离不开运动员的撑场。更重要的是,运动队可以代表学校参加竞技比赛,挣得名气和不菲的经济收入,并且带动校友捐赠,以及吸引更多热爱体育的申请者。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名校对运动员的厚爱。鉴于运动员学业表现往往较弱的事实,通常会降低录取标准。在哈佛大学的2013级新生中,就有12.8%是

作为运动员被录取的,其SAT分数平均比普通学生低173分。

另外,对校友子女的倾斜,是美国高校招生中最广泛使用的特权,几乎存在于所有私立高校,甚至一些旗舰公立大学。2011年的数据显示,在耶鲁大学分别是30%和6.2%,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差距则最大,分别是33%和8.5%。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招办主任史蒂芬·法默也曾承认:“对于州外的学生,校友子女的身份在录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招办优先考虑校友子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有助高校传承办学历史和使命、提高注册率、回报校友给予的“才能、时间和财富”支持,因此不同于对其他后代隐形关照的否认,该倾斜是私立高校坦率声明的录取优先项。但需指出的是,许多校友子女的身份成就并不一定低,被录取未必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作者分别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和博士后。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面上资助课题“政治视野下的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机制研究”[2018M632072]研究成果之一)

